

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理论的批判性超越

周露平

摘要: 马克思的反贫困哲学是对黑格尔贫困理论的批判与超越。黑格尔贫困理论聚焦了市民社会中贫困与贱民这两大问题。它们作为马克思反贫困哲学的理论环节,为之提供了批判素材与超越目标。但黑格尔贫困理论不能提供消灭贫困的路径,因为它仍深陷贫困考察的旧世界观之内,与所有权致贫等考察方式并无二致。与之相对,马克思考察了现代致贫的社会根源,把握住现代阶级的革命主体:资本生产积累其实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贱民是能够变革世界的无产阶级。由此,反贫困哲学被马克思提升至这样的现实高度:消灭资本、阶级革命与消灭贫困的有机统一。换言之,马克思的反贫困哲学并未简单停留于解决贫困现象,而是解决与贫困相关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创立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社会。

关键词: 马克思;反贫困哲学;黑格尔;市民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A811.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0)04-0001-11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0.04.002

一、引言

在思想史上,黑格尔的贫困理论对马克思反贫困哲学有着重要影响。黑格尔最早将贫困问题与现代世界联系起来,直接聚焦市民社会与贫困发生的内在关联,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与现实价值。正如泰勒所言,“对 19 世纪初黑格尔的一些著作的研究表明,他那时已经深刻思考过工业社会增长与物质和精神贫困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思考达到了令人惊讶的深度,因为他所思考的问题先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1](P597)}。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他肯定了黑格尔的贫困理论与马克思的内在关联。因此,马克思如何批判性超越黑格尔的反贫困理论,作为一项重大议题深嵌于马克思反贫困哲学之内。有国外学者指出两者在贫困维度上的理论继承性,“我们已经看到了黑格尔是怎样把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比作一个奴隶的:一个连贯的思路导向了马克思对‘雇佣奴隶’的谴责;绝非偶然的是,青年马克思已经参加过甘斯做的演讲,后者正是《法哲学》的出版者”^{[2](P221)};必须推进的是,马克思的反贫困哲学体现为对雇佣奴隶的批判,即批判性改造了黑格尔的贱民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的讨论有拔高黑格尔贫困理论的倾向:一是“贱民与无产阶级关系”的政治哲学解读^[3],二是消灭制度性悖论以超越黑格尔^[4]。它们淡化了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内在向度,即这些讨论并未澄清马克思如何自觉从黑格尔贫困理论中突围,并指向这样的理论建构——在社会运动中扬弃资本与超越现代贫困的协同推进。因此,需要在反贫困的视域中,严格区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贫困问题的考察前提、理论立场与解决方案的本质性差异。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论域与理论效应”(18FZX024)

作者简介: 周露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woshizhouluping@126.com (上海 212004)

二、贫困思想史的补遗：黑格尔贫困理论的定位与反思

马克思查阅了很多理论著作与现实资料，以弄清社会贫困情况。一方面广泛研究前人的贫困理论。马克思着重研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尤尔的工厂哲学、舒尔茨的工艺学理论、拜比吉的机器论、李嘉图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等对贫困的思考。另一方面对贫困现实的考察研究。马克思通过调研报告、报刊杂志等考察现代贫困现象，如《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工厂视察员报告》《公共卫生报告》《总结报告》《皇家铁道委员会报告》《泰晤士报》等。除了贫困思想史补遗之外，马克思还批判黑格尔的贫困理论，以助力完成其反贫困哲学的理论构建。

（一）前黑格尔的思考：贫困思想史的补遗

在古希腊以来的思想史中，贫困问题作为一个高度隐晦议题未占有重要位置。但贫困作为难以回避的现实，在思想史上留有反思痕迹，并可以剥离出隐匿的理论线索。换言之，古希腊以来的思想史已经意识到贫困生成与财富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一，古希腊注重社会等级与财富建构的关系。社会等级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化。思想家们将等级制度形成的绝对贫困归因于财富管理的技术化问题。古希腊哲学提出了政治管理技艺与城邦生活统治的高度统一；但城邦政治的运行机制掩盖了财富生产与成员贫困之间的关联——经济利益只是作为现象存在于财富管理之中，社会致贫与家庭贫困是由于财产维护与财富增长出现了问题（注意马克思关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思想的分析）。如色诺芬的《经济学》关于经济的定义，就是家庭财富管理；亚里士多德将之转化为谋生术与货殖术^{[5](P178)}，即财富的保有与失去需要一门技艺即财富加工生产的过程等。这些讨论提示着，贫困现象是由于不合理的财富管理所造成的。简言之，古希腊已经萌芽出财富与贫困的矛盾对峙，并尝试以管理技术来解决贫困问题。

第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侧重“富国裕民”的规律，淡化贫困生成的现实。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发展现代资本提供理论资源与规律说明，目的是批判封建社会的财富生产屈从于政治统治。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对资本发展提供理论论证，为实现社会财富增长提供“科学规律”，以此彰显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的本质区别：他们否定任何阻碍财富增长的社会内容，但漠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事实。比如，李嘉图对“济贫法”颇有微词，“救济法的作用，使富强变为贫弱，使劳动的努力仅仅为了生计，使智能优劣的界限紊乱，使人类心灵，为满足肉欲而不绝忙碌，最后，使一切阶级陷于贫困”^{[6](P50)}。故他认为，财富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贫困，而是为了发展国家经济。与之相应，卡耳佩伯、乔·柴尔德、伊登，包括斯密都使用过“劳动贫民”概念，将其简单定位为“好逸恶劳”的贫困者^[7]。因此，古典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立场是严格排斥贫困劳动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创造财富的国民经济学为“伪善形式”，即“17世纪经济学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因为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8](P32)}，即无产阶级贫困可以忽略不计或理所当然，被排斥在“富国裕民”的制度设计之外。简言之，这种伪善形式无限包裹着资本生产与贫困生产的矛盾对峙。

第三，政治哲学倚重政治管理的技术。政治哲学侧重于通过国家技术化管理提高财富生产，以防止贫困发生与扩大。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为例，它澄清了君主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关系，这是古希腊的技艺观在现代世界的完善与深化。马基雅维利认为，与传统等级世界不同，现代国家统治是一种技术，可以通过改变国家内部的质料（人民群众）与形式（管理手段）完成对贫困

的控制。换言之，贫困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机运”的结果，即贫困并非是神意或君意；而是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的双重建构之后果，需要通过合理化的政治管理加以规避，如明君统治、开明政治等。由于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任务的限制，同样只是碎片化地观察了贫困现象，即将贫困考察作为政治理论的边缘物。

总之，尽管这三条线索在社会管理、制度设计与贫困控制等方面涉及贫困问题，但由于研究视域、历史背景与阶级立场等的限制，它们只是将贫困作为社会的边缘现象，不可能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内部对贫困现象有过理论反思，主要聚焦于两大路径：一是浪漫主义反思。如卢梭与西斯蒙第，前者从自然主义视角批判“社会进步与人类贫困”的矛盾性；后者从财富发展是为人还是为物的，提出财富生产的“非人性”。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以浪漫主义方式对贫困加以反思，试图以自然原则超越现实贫困。二是所有权批判。这以普鲁东为代表，他认为“所有权是盗窃”^{[9](P40)}，所有权是现代致贫的根源，即所有权破坏了社会正义，导致现代贫困的形成。普鲁东及其后继者如达里蒙等人都以所有权或法权作为武器批判贫困成因，但由于他们并未思考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制度原因，因而回到了小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因此，这两种反思路径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真正切入现代贫困形成的社会条件。就理论高度而言，贫困问题的现实反思是在黑格尔这里才得以系统性呈现。

（二）黑格尔的贫困诠释：马克思反贫困哲学的批判资源

黑格尔的《伦理体系》《耶拿体系草稿 I》《耶拿体系草稿 II》《法哲学原理》等文本都涉及贫困研究。它们交代了这样的时代命题：与日益富裕强大的英法等国相比，分裂落后的普鲁士王朝表现出普遍性贫困。经济学家李斯特焦虑的是国家生产力，而黑格尔则思考关乎本国国运的两种贫困现象——国家的整体性贫困与社会民众的普遍性贫困。就讨论重点而言，他侧重于讨论市民社会即社会民众的贫困成因。一方面，黑格尔意识到贫困生成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劳动的抽象化与满足的具体化^{[10](P210)}的矛盾关系导致了片面化的社会分工。它造成劳动者被机器取代从而导致贫困问题，“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10](P210)}，即自动化生产驱逐劳动者而致其贫困。另一方面，劳动与需要满足的关系蕴含着这样的矛盾：社会财富是普遍性的力量，同时也是控制社会的特殊利益内容；部分成员因失去财富陷入贫困而被统治。因而黑格尔认为，贫困问题是财富丧失且利己心被破坏的结果，然后才会出现丧失正义、正直与自尊等情绪的贱民^{[10](P244)}。至于财富如何丧失，黑格尔并未加以明确说明。

那么，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呢？黑格尔认为，应该在市民社会内部加以分析与解决。市民社会是由需要体系、普遍财富的所有权保护、警察与同业公会的关怀三个环节构成。因此，黑格尔解决贫困的构想主要包括：第一是满足贫困者的需要，无限放大它们的利己心，如通过发展商业贸易、开拓海外殖民等，加剧私人财富的积累。第二是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社会财富，建立社会帮扶机制，消解贫困者对市民社会的反抗情绪，以防止贫困者向贱民的转变。第三是通过社会职能来解决贫困。黑格尔认为，前面两个环节是不充分的，因为穷人如果不劳动就获得生活资料，这与市民社会的利益准则相违背。因为市民社会的功能在于发展财富，而不是保护穷人与防范贱民，即“它所占有的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总是不够的”^{[10](P245)}。因此，解决贫困与贱民问题需要社会职能，如黑格尔对同业公会相当重视。他认为社会成员通过它获得了普遍化的生活方式，因为同业公会承担了救济社会贫困、规范成员行动、赋予成员自尊等重任，“在同业公会中，对贫困的救济丧失了它的偶然性，同时也不会使人感到不当的耻辱”，“只有在同业公会中，正直才获得其真实的承认和光荣”^{[10](P250)}。但黑格尔执着于理念或精神运动的外化形式，那么这种批判只是关于贫困现象的外部反思，故肯定不能解决贫困现实，原因在于他并未看到资本扩张

与同业公会^①瓦解的协同演进,即资本生产导致了现代贫困。

(三) 基本定位:黑格尔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

由于没有面向资本现实,黑格尔的贫困思考不可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他试图通过伦理国家解决市民社会的贫困与贱民问题。如,《耶拿体系草稿 II》专门讨论了机器化生产、贫困与财富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变成意志矛盾与内心反抗过程。显然这样的思辨方式只停留于精神反思层面,不可能真正澄清现代贫困的社会原因。《法哲学原理》将贫困作为社会边缘性现象,即贫困源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丧失。个体贫困作为特殊性的“脱域”,存在于偶然的、自然的和各种外部关系之中。这种脱域是由于市民社会的普遍权力完全取代了家庭,“关于穷人问题,普遍权力接替了家庭的地位,它不但顾到他们的直接匮乏,而且顾到他们嫌弃劳动的情绪,邪僻乖戾,以及从各种状况中和他们所受不法待遇的情感中产生出的其他罪恶”^{[10](P243)}。正如前文所述,其解决方案只能通过社会职能或国家行动,以弥合权力的普遍性与个体的特殊性间的“间隙”,如殖民事业、同业公会与社会救济等。但这些内容只是资本范围内的修复工作。换言之,与古典经济学类似,黑格尔还是在资本主义视域内提出符合资本利益的解决方案。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的,但其思考内容却为马克思提供了反思对象与批判内容。从“异化劳动理论”到“资本批判理论”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批判性吸收过黑格尔的贫困理论。第一,黑格尔贫困理论提出了现代问题。与前面三条考察线索相比,黑格尔已关注到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二律背反问题”。由于现代财富积累机制与劳动分工机制必然会出现诸如贫困与贱民的问题,由此,黑格尔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10](P245)}。马克思将这个重大命题纳入资本增殖的历史宏大叙事之中,提出贫困问题应该以资本发生学加以确认,由此马克思开启对现代资本的批判。

第二,从贱民到无产阶级的视角转换。黑格尔认为贱民是其主观情绪的产物,因为贫困违背了自由精神或自由意志,贱民的形成是由于其自食其力的情绪消失而自甘堕落。一方面,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贱民思考,认为贱民的形成是历史运动的结果,即它是现代资本运动的后果。另一方面,马克思将贱民问题转化为无产阶级现实化及其革命问题。这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无产阶级主要源自于社会变动,“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11](P17)},故无产阶级有改变世界的革命任务,这与黑格尔的消极贱民理论划清了界限。

第三,贫困与所有权关系的理论定位。诸如普鲁东的所有权致贫论即所有权就是盗窃,主要是从生产力视角考察贫困问题,颇具迷惑性。马克思通过批判性吸收黑格尔的想法,形成了贫困生成的生产关系视角。由此,马克思发现了蒲鲁东所有权批判的理论症结——普鲁东的所有权批判只是浪漫主义批判,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如,蒲鲁东引用孔德的案例,用浪漫主义方式描绘了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劳动过程^②。尽管“劳动者即使在领到了工资以后,对他所生产出来的产物有一种天然的所有权”^{[9](P135)},但劳动者并未对劳动成果有支配权即所有权。故他认为贫困源于这种所有权的丧失,但并未追问所有权的本质来历,这显然是一种浪漫主义批判。马克思重新定位了所有权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即将它们都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所有权是资本的法权关系,而贫困是这种法权关系的现象,它们都是由资本生产所造就的。

须予以说明的是,黑格尔在社会财富发展与贫困贱民形成的二律背反上,提出解决贫困在于市

^① 黑格尔看到的是,同业公会基本上是德国的封建行会手工业的强制联合。

^② 普鲁东引用孔德的“清理土地”案例,以说明资本家利用所有权占有工人的劳动,具体见[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晔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5页。

民社会帮扶机制的同时，还提出伦理国家的保障制度。但就理论向度而言，黑格尔已经意识到，贫困与贱民是伦理国家的顽疾而难以根除。那么，黑格尔的贫困反思只要对伦理国家加以推进，就能得出社会致贫的制度问题。由于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局限，黑格尔显然不可能真正提出超越两者的具体路径，只能通过社会帮扶与国家保障，如资本生产、商业贸易、殖民活动、社会慈善、同业公会等来减轻或缓解贫困与贱民问题。与之相对，如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通过各种事实反驳了黑格尔的思考，指出资本生产与商业贸易的迅猛增长与消灭工人贫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同时，对黑格尔的解决贫困的思考提出了批判意见，“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灭劳动群众的贫困”^{[12](P10)}，原因在于劳动的异化性质或雇佣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造就的，而非其他。换言之，假如不转换社会生产方式，那么社会贫困则与资本生产一起裹挟前行。因此，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分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能否解决贫困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两人反贫困思考的差异，也是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重要立足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并未真正理解黑格尔的反贫困理论^①，因为他对市民社会运行机制还不太了解。正如望月清司所言，“我们甚至不得不说，马克思还没能深入到《法哲学》（特别是‘需要的体系’一节）的内在逻辑，还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水平”^{[13](P26)}，即包括《德法年鉴》、《巴黎手稿》等时期只是从“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入手，而真正作出批判建构是在《资本论》及手稿时期。例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找到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源，即贫困生成于现代资本主义运动等。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解决贫困的思考提出了反驳意见，“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灭劳动群众的贫困”^{[12](P10)}。

总之，马克思已经理解贫困生成与劳动异化的现实关联——假如不变革社会生产方式，那么社会贫困则与资本生产“并驾齐驱”。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不断追问这样的问题，并推进至《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反贫困研究：现代市民社会能否通过自我革命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成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贫困思考的理论分野，亦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性超越的问题基础。

三、理论解构：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理论的批判性解读

黑格尔已意识到资本主义必然带来“厄运”——资本创造了市民社会难以消解的贫困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关于这种厄运的认识，不是浪漫主义或伦理主义反思，抑或是所有权的批判，而是切入现代市民社会的洞察工作。但问题在于尽管黑格尔熟稔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并未对现代资本展开剖析，显然这个批判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我们以为，资本范式的发现使马克思发生了巨大的思想转变——马克思面对黑格尔哲学时，已经站在资本生产的巨大镜像面前，其主要任务是剖析贫困的社会成因，为超越贫困提供解决路径。进一步追问，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贫困理论到底作出了哪些批判性解读呢？

（一）致贫剖析从理论原则向历史演化的转变

马克思批判性改造了黑格尔贫困理论的历史原则。例如，《法哲学原理》将贫困与贱民问题放在“伦理篇”的市民社会中予以解读，那么社会致贫的原因、表现及解决等处于市民社会之中，而

^① 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提出了批判，但这种批判目的不在于对贫困问题的理论展开，而是服务于其他研究任务，具体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以及《巴黎手稿》等文本。

非国家本身。不可否认,黑格尔对贫困思考首次注入了历史性原则,即把历史性视角引入了贫困成因的考察过程。但黑格尔并未将这种历史性视角加以现实化,而只是在精神反思领域作出了说明。

与黑格尔完全不同,马克思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存在的外部矛盾到市民社会运动的内在矛盾的转变,真正开启了对现代资本的历史批判。具体而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扭转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性质,认为贫困问题与物质利益有密切关联,进而提出在市民社会的现实运动中解决贫困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于无法从贫困的历史成因出发,就不可能对现代贫困的生产机制加以科学说明,只是借助异化劳动理论加以揭示,无产阶级贫困是由于他们从事的是谋生活动,即谋取生活资料的活动,“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11](P124)},因而是异化劳动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用自发分工诠释异化劳动的起源,“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P537)},由此形成了现代致贫的理论线索:自发分工导致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形成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形成了无产阶级贫困。马克思提出,只有解决自发分工,才能解决贫困问题。因此,马克思设想了消除自发分工(异化劳动)、消灭贫困的共产主义样态:无产阶级控制社会生产的全部过程,以获取社会财富的占有能力,实现自我的全面自由发展。《共产党宣言》提示了全球化贫困与现代资本的内在关联:资本以全球化贫困作为自我增殖的世界基础。故资产阶级生存与统治条件是资本生产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积累,换言之,资本生产积累必须以无产阶级贫困积累为基础。《资本论》及手稿回到历史构境中考察贫困的深层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致贫现象与生成规律等,即在劳资关系对峙中,资本通过生产资料的雇佣化,占有剩余劳动而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简言之,马克思考察现代贫困机制有了新世界观的维度,并深度把握为对现代资本的批判。由此,马克思以新世界观的维度陆续考察,诸如“五形态理论”或“三形态理论”的贫困理解的变迁方式、从生产力视角到生产关系维度考察贫困成因的转变原因、从贫困人口到无产阶级的转化形式、从贫富分化到阶级斗争的深化表现等内容。

(二) 贫困考察从哲学视域向经济学研究的转变

黑格尔给予古典经济学以强烈关注,特别在市民社会分析中,引入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与需要”建构自己的法哲学体系。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的自为存在的缺陷,认为它有形成贫困与贱民的可能;但他不可能看到这种贫困与贱民所引发社会危机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黑格尔认为,一方面,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精神的演绎环节,市民社会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国家层面得以解决,即自在自为的国家精神能够扬弃市民社会的贫困现象,故贫困与贱民问题并未出现在国家环节;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精神自我实现的过渡环节,其内在的缺陷性与不充分性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贫困现象作为一个边缘议题同样也是如此。这两个方面证实,尽管黑格尔关注过古典经济学,但研究视域仍局限于哲学思考,肯定无法提供资本致贫的经济学的审查方案。

与黑格尔相对,自《德法年鉴》开始,马克思并非简单停滞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法哲学议题,而是转向更高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站在物质利益与人类解放关系的高度,对现代世界提出原则性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现代世界的运行规律与致贫机制加以科学剖析,提出反贫困的解决方案。如,《资本论》及手稿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原因。

第一,劳动力商品化是现代工人的贫困根源。雇佣劳动关系成为异化劳动的现代表达,即资本必然会使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贫困。换言之,现代雇佣关系生产出大量提供剩余价值的贫困劳动者;极端的贫困状态推动工人必须走向工厂,接受资本的剥削。

第二,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辩证统一。资本的目的就是不断吮吸无产阶级的无酬劳动,进而将后者无限贫困化。因此,资本积累过程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且聚焦为三个方面:其一,资本积累需要劳动者贫困。马克思称之为一无所有且自由流动的劳动者。其二,资本积累需要更多的

劳动力，创造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其三，资本积累支配无产阶级，使之从属于扩大再生产的必要环节，“就表现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集聚”^{[5](P721)}。

第三，工作日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界限。工作日是两大阶级对立与争夺剩余价值的时空；同时它是资本控制工人的途径，那么资本生产表现为贫困的双重生产：一是绝对贫困的生产。无产阶级高度服从于工资日的弹性生产规律。假如违背这个规律，必然失去工作，也就是失去工资而贫困。因此，工作日是绝对贫困的生产界限，与剩余劳动的绝对性占有紧密相关；同时也关联着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5](P274)}。二是相对贫困的生产。由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相对延长工作日时间，使得无产阶级贫困实现技术性固化。相对于资本的积累效果与积累质量，无产阶级的生活资料是相对减少的，而处于相对贫困。简言之，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工人都是贫困化的无产阶级，严格服从于工作日的动态调节，接受资本统治。

（三）贫困批判从外部反思向内部批判的转变

黑格尔关于贫困的考察是以思辨逻辑为主导的外部反思。黑格尔将劳动抽象为精神劳作，体现为“实体即主体的辩证法运动”。劳动立场仅仅体现为精神运动，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仍然只是一瞬间”^{[11](P209)}，这一瞬间就是精神定义世界的反思过程。显然贫困现实无法得以感性把握，变成概念反思的抽象环节，即黑格尔的劳动内容是抽象的概念，是实践的意识，而对象是实践意识所建构的无实体性内容，是幽灵化存在。由此，劳动者的劳动及其贫困现实变成了抽象的理论问题，而非异化意义上的现实情境。换言之，黑格尔看到了贫困生成中的劳动内容，但只是将劳动作为精神演绎的环节，那么肯定无法通过劳动视角来揭示现代贫困问题。

与黑格尔的劳动观完全迥异，马克思将这种精神劳作拉入现实生产，将劳动作为生成世界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史，则聚焦为劳动如何创造世界史，也是劳动异化（雇佣劳动）致使无产者贫困的生成史。如“异化劳动理论”时期，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劳动”，质疑贫困的劳动起源；《雇佣劳动与资本》时，明确异化劳动是雇佣劳动，即资本是雇佣劳动或异化劳动的成因；《资本论》及手稿详细交代了异化劳动的资本化与雇佣性；同时，雇佣劳动固化了现代贫困的社会根基。马克思明确是资本控制无产阶级劳动，进而调节他们的贫困样态，如资本对劳动力或劳动者的指挥权；强迫工人从事超出生活需要的剩余劳动，“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5](P359)}。换言之，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劳动理论，真正切入了现代贫困的社会根源。

一方面，现代贫困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协同演进。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多数人的财产变成了少数资本家的财富，同时塑造出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进而，马克思详细考察了现代世界的贫困起源——现代贫困不是理性规范的结果，而是血淋淋的惩治措施与法律内容的后果，如对流浪汉与农民的处置。英国的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詹姆斯一世，法国的路易十六等都对流浪汉进行了严酷的处罚，目的是让这些流浪者进入工厂，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形成相关的法律、纪律内容，“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5](P846)}。简言之，现代资本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劳动结构，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游离出来，形成贫困的雇佣工人，进而建构出现代劳资对峙的社会结构。

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新理解。黑格尔强调了劳动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但他认为，“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然而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则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10](P244)}。劳动者由于无法自食其力，必然向贱民转

变：一是贱民的产生源于生活水平的下降。黑格尔认为贱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源自于社会。二是社会生活的内容就是劳动。但他将自食其力的情绪作为衡量一般民众的特征。假如没有这种情绪内容，就会形成贱民，因为它们没有善恶观念而自甘堕落。三是需要注意贱民与贫民的区别。前者是情绪的堕落，即贱民不会对现实存有内心反抗，而后者只是财富的丧失。因此，黑格尔认为劳动是必须的，假如不劳动，必然会出现贫困与贱民。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贫困考察是独断论的，因为后者没有看到资本、贫困、贱民三者的内在关联，而将贱民问题仅仅归结为人性论批判。马克思一直反对这种人性论批判。马克思从现实的劳动出发，认为贱民是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是反抗资本世界的革命力量即无产阶级。那么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局限于精神劳作本身，而是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简言之，《资本论》及手稿从劳动视角超越了黑格尔的判断，实现了从资本致贫的劳动异化解读向雇佣劳动诠释的格式塔转变。

总之，马克思的立足点是劳动颠覆资本的社会革命，而黑格尔强调资本修复劳动的理论可能。马克思将贫困问题放在整个社会变革运动之中，不像黑格尔试图通过社会内部的修复与调整来改善贫困。

四、现实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理论的批判性超越

黑格尔的哲学立场赋予了贫困理解的三大向度：第一，否定资本批判的理解方案。这种方案正视国家内部的贫困现象，但不是将贫困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问题，进而未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第二，否定唯物主义的反贫困诠释。在贫困研究过程中，这种诠释只强调物质利益的满足问题，而没有从历史辩证过程中找到致贫的本质来源，进而走向了思辨的唯心主义。第三，否定社会主义的贫困解决。它认为贫困只是社会边缘现象，原因在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利己原则，反对社会力量对贫困的改造。有了这三大向度，黑格尔的理论立场决定了现代贫困的难以解决。究其原因，他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与致贫规律。只有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双重研究，确立了现代贫困的产生根源与解决路径。

（一）贫困成因的历史观革新

旧历史观或资产阶级历史观认为，贫困不是由于劳动者不能融入资本生产而导致的，而是无产阶级的“能力缺陷”、“生理缺陷”与“机会缺陷”等问题所导致的。作为新历史观的唯物史观确立了贫困成因的实践逻辑，如《资本论》及手稿讨论了贫困运动的资本逻辑成因，从社会生产机制上提出了贫困内容的资本规律，完成了历史观的革新。一方面，生产资料的资本化生产必然造就现代性的贫困样态。因此与黑格尔的贫困理解相对，马克思转向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批判——马克思找到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及其社会化内容。另一方面，商品所有权转向资本主义占有权，说明无产阶级贫困是由资本占有权所导致的，而非商品所有权或法权占有制所形成的，即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破解现代贫困难题。新历史观的转变不再立足于“劳动与贫困”的表象矛盾，而致力于“资本如何致贫”的根源探讨，即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的复杂性矛盾。

就历史观而言，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贫困研究具有本质差异。一是核心研究与边界研究相联系。其核心研究就是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辩证关系，这是《资本论》研究的核心，同时也是黑格尔贫困理论难以解决且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边界研究是说明《资本论》研究与黑格尔的有边界。黑格尔是哲学反思，仅仅把握为以思辨哲学方式消灭贫困；而马克思直接将贫困定位于无产阶级，而非精神性的贱民。

二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分析相结合。《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贫困成因研究分为两大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表现为对农业土地的剥夺、强制农民、手工业者离开生产资料，形成资本生产最

原初的生产工人，这是历史研究的结论；“资本生产积累阶段”，主要体现为资本积累如何形成与固化现有的无产阶级，这是现实分析的结果。因此，《资本论》用了很长篇幅与详实案例评析了现代贫困的产生过程，体现了历史研究与现实分析的有机结合，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社会根源。显而易见，黑格尔的反贫困理论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演绎，以概念的思辨形式对贫困问题加以逻辑分析，并未面向资本现实。

三是解决方式与研究方法相统一。马克思的贫困研究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现实，因此他的研究方法是现实的、历史的与矛盾的复杂性建构，而黑格尔的研究方式是抽象的逻辑演绎，因此导致两者的反贫困方式完全迥异——黑格尔的解决贫困方式是通过资本发展来扬弃的，尽管以理性演绎的方式表述，仍属于外部反思；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是内在批判，体现为解决贫困问题与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机结合。

（二）贫困批判的现实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黑格尔贫困研究是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则扬弃了这种抽象的考察方式，直接面向贫困现实。一方面，无产阶级及其后备军的急剧增长，形成了普遍化的无产阶级贫困。前面已提及，资本积累数量决定了贫困工人的庞大数量，这样的后果就是他们由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而严格从属于资本，成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因此，现役无产阶级队伍与产业后备军的贫困直接证实，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表现为一种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在这基础上，《资本论》详细交代了四种过剩人口的贫困化：流动的过剩人口（新老更替的生产工人）、潜在的过剩人口（农村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现役工人的相对过剩）与救济人口（产业后备军的补充）资本积累中如何贫困化^{[5](P738-741)}。这四种过剩人口的存在直接论证了资本如何塑造出庞大规模的贫困人口，那么资本增殖与工人贫困成为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对峙互动。关于社会贫困内容的思考，黑格尔只是通过“贫困与贱民”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并未真正面向贫困的起源与发展规律问题。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黑格尔的贱民只具有概念上的抽象，没有把握住这样的事实：这种贱民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中失去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获取工资的劳动者。因此，贱民的贫困不能仅仅表述为一种情感或情绪反抗的贫困者，而是经过资本模式改造过的生产者。这种模式必然形成了特殊的“依附关系”，即无产者由于贫困只能依附于资本增殖，“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不能脱离资本”^{[5](P708-709)}。尽管他有选择不同资本家的权利，但没有利用生产资料的权力。

因此，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固化与贫困积累。换言之，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再生产，“积累过程的机制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已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5](P710)}。简言之，资本生产积累其实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

（三）贫困批判的路向聚焦

与黑格尔相对，马克思已经证实了现代贫困的制度性设计，聚焦着资本批判与贫困批判关系的三大事实。第一，劳资对立造就了普遍化贫困。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变革时期，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时代转换，贫困性质与内容发生了本质变化，体现为劳资对峙下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后备军的极度贫困。第二，现代贫困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现代性发展的缺憾以贫困形式表现出来，那么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并不能证明现代性的永恒性，根源在于它们无法解释贫困现实。那么现代性发展其实是无产阶级大尺度的贫困化进程，体现为整个世界的两大阶级对峙与革命，由此反贫困高度聚焦为无产阶级颠覆资本社会的革命运动。第三，现代资本与社会贫困关系的悖论、争议。社会矛盾就是现代性引起的资本家与贫困劳动者的对抗，那么，现代性批判表现为对

现代资本的批判。尽管现代资本与社会贫困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容易形成诸如资本致富还是致贫、社会财富是被劳动逻辑还是资本逻辑所决定、消灭贫困是历史终结还是历史进步等悖论、争议，但只要没有上升至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那么这些争议就不能真正面向现代贫困及其负载的社会矛盾。面对这三大事实，马克思提出了详细的反贫困路向。

第一，反贫困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运动。马克思之前的贫困反思史主要从道德批判或浪漫主义批判出发，走向了人性论批判^①；马克思则真正面向现代市民社会的现实，提出了反贫困的批判主张——反贫困不仅仅是社会财富的生产机制与分配机制的问题，而必须将之归纳至阶级斗争的革命视域。在这个视域中，才能理解贫困问题如何贯通人类历史进程，并以阶级斗争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反贫困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方向，为马克思重新创造了一种历史进步观，即反贫困不仅提出解决贫困，还要解决与贫困相关的阶级斗争，提出新社会的创造问题。

第二，反贫困是雇佣劳动的扬弃过程。反贫困不是静态的批判行为，而是历史辩证法的扬弃过程。反贫困是历史动态的自由人联合过程，是财富创造过程中加以扬弃的过程，是动态的批判历程。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就设定了自由的生活生产状态，如“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1](P537)}。换言之，职业的固定化与异化（即自发分工）导致了生产性贫困，即在现有的资本生产条件下，雇佣劳动（或劳动异化）^[14]是贫困的根本性原因。但马克思不是全盘否定异化劳动，而是认为异化的形成与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1](P182)}，即应该通过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扬弃市场经济的否定性，为进入新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与全面发展的内容，“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P874)}。

第三，反贫困关乎无产阶级的未来图景。在黑格尔那里，贫困问题是市民社会的边缘现象，它的存在无关资本发展的大局；与黑格尔相对，马克思坚信反贫困直接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未来图景。马克思批判的重要落脚点是，黑格尔坚信市民社会的贫困与贱民问题，可以在市民社会的精神逻辑运动中，特别在向伦理国家的演绎过程中得以扬弃。显然黑格尔没有看到，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是贫困产生的本质根源，故不可能真正澄清现代贫困的社会实质与运行机制。而马克思则看到了资本致贫的残酷性与无产阶级摧毁资本的革命力量，特别是无产阶级可以创造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总之，由于理论立场的限制，黑格尔不可能直观到资本生产的现实症结，无法澄清现代贫困的本质来历，故不可能提出超越贫困的根本路径。与之相对，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反贫困哲学，为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与理论预测。

参考文献

- [1] [加]查尔斯·泰勒. 黑格尔[M]. 张国清,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 [2] [意]洛苏尔多. 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M]. 丁三东,等译. 长春:吉林出版社,2008.
- [3] 潘斌. 从“贱民”到“无产阶级”: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问题的政治性重构[J]. 哲学研究,2018(9).
- [4] 夏少光. 消除现代社会的苦恼与超越黑格尔——对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一种解读[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1).
- [5] [德]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6] [英]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郭大力,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7] 周露平.《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及其新时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2).

① 这种人性论批判，要么认为资本致贫是不人道的，要么认为劳动致贫是不人性的。

- [8]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法]蒲鲁东. 什么是所有权[M]. 孙署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10]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1]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日]望月清司.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M]. 韩立新,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4] 周露平. 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与历史限度[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2).

Marx's Critical Transcendence of Hegel's Poverty Theory

ZHOU Lu-ping

Abstract: In term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Marx's anti-poverty philosophy is the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of Hegel's poverty theory. Hegel's poverty theory focuses on two major problems of poverty and untouchability in civil society; they serve as the theoretical link of Marx's anti-poverty philosophy, providing critical material and transcending goals. But Hegel's poverty theory cannot provide a path to eliminate poverty, because it is still trapped in the old world view of poverty investigation, which is not different from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of ownership-induced poverty. In contrast, Marx investigated the social roots of modern poverty and grasped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of the modern class; capital production accumulation is actually the accumulation of poverty of the proletariat; the untouchables are the proletariat that can transform the world. As a result, the anti-poverty philosophy was elevated by Marx to a realistic height: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elimination of capital, class revolution, and the elimination of poverty. In other words, Marx's anti-poverty philosophy does not only solve the phenomenon of poverty, but als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related to poverty and create a new society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Karl Marx; anti-poverty philosophy; Hegel; civil society; capital

(责任编辑 孙 洁)